

改写理论之赞助人系统

——武曌对《大云经》与《华严经》翻译的操纵

张青青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00)

提 要:借鉴当代翻译理论来探讨经书翻译的研究日渐增加,其中不乏有关佛经翻译的研究。佛教在唐代影响大,武则天时期达到鼎盛,而武曌是中国第一位女皇,研究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有着特殊价值。武曌作为权力的代表对译经活动的赞助起着关键性作用,赞助人武曌从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权势地位三个方面操控佛经的翻译。具体来讲,从利用《大云经》的翻译以掌握政权,到操纵《华严经》的改写巩固其政治地位,从选材到译经的接受,武曌对佛经翻译的操纵无处不在。

关键词:赞助人系统;改写;武曌;佛经翻译;操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1)06-0125-04

Patronage System of the Rewriting Theory:

Empress Wu Zhao's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

ZHANG Qing-qing

Abstract: Buddhism in the Tang Dynasty achieved its prosperity during the time of WU Zhao's control. Standing for the authority, Wu Zhao played a critical role of patronage in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Buddhist Sutra. She exerted her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 in three areas: ideolog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status. By manipulating the rewriting of *Da Yun Sutra* and *Hua Yan Sutra*, she seized the power firmly and consolidated her political status. Wu Zhao's manipula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utra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either from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materials or from the reception and effect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patronage system; rewriting; WU Zhao; Buddhist Sutra translation; manipulation

武曌^①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特殊,她以女身为帝王,开创了唐代中国政治的新局势。在武曌统治的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佛经翻译也处在鼎盛阶段。作为政治中心人物,武曌是权力操控者,她对佛经翻译的赞助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目前有关武曌对佛教发展的影响方面已有不少研究,如陈寅恪(1980) ,但前人主要着眼于政教关系,剖析了武曌怎样利用佛教实现政治目的,尚未有人从翻译改写的角度解析这位女皇帝在译经活动中的赞助人角色。本研究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大云经》以及《华严经》的改写为主要语料,展开赞助人系统的三个成分,解读武曌对佛经翻译的操纵和制约。从佛经材料的取舍,译经内容的过滤或改写,到译著的传播和接受,都有武曌操控的影子。

1. 赞助人系统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当代翻译理论,该理论使翻译研究突破

了传统的语言层面的研究范畴。勒菲弗尔(Lefevere, 1992: 14)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任何翻译都是在特定的接受环境中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操控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改写。无论改写者出于何种目的,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行使权力的形式出现,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掩盖在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或权力下的翻译或改写必定受到目的语的主流诗学、权力和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

勒菲弗尔(Lefevere, 2004: 15)提出,操纵控制文学系统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文学系统之内的专业人士,包括翻译家、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等;另一种是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即权力的代表,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创作和改写的个人或者机构,包括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一部作品的翻译出版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行为,从译著的选择、出版到译著的接受,都

^① 《旧唐书·则天皇后传》记:载初元年,神皇自以“曌”字为名。

有赞助人在背后起作用。赞助人主要通过其三个方面实施对改写的操控:意识形态,利用意识形态制约人们的行为习惯、信仰,控制译著的形式和主题的选择;经济利益,作为作家、翻译家等提供物质保障,在经济上予以控制;权势地位,改变译者的社会地位,使译者融入某种社团及其生活方式,最终为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赞助人服务。意识形态是赞助人或权力的意志体现,所以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们利用话语权力对翻译策略的选择甚至是整个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因此,赞助人对文学家或翻译家的意识形态操控直接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

武则天时期(655-705年)佛教迅速发展,佛经翻译也进入鼎盛时期,这与当时统治者的支持与赞助息息相关。从655年被立为皇后时起,国家政治权力也就掌握在武曩之手,她对佛教的赞助直接影响着佛教以及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

2. 武曩与佛经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受政治的影响和制约较大,尤其与中国皇权统治密切相关。按照儒、道之理,妇人不能参与国政,更不可能登上帝王之位。武曩革唐立周,不能从儒、道经典中寻求理论根据,从而转向佛教大乘派经典,赞助改写以女身授记为转轮圣王成佛的教义,证明其登上皇位的合理性,实现掌握政权之目的。然而,武曩与佛教的赞助关系,不仅有着政治因素,更与她自身崇信佛教有关。武曩的母方家族是隋皇族杨家,而杨家信佛,这与武曩崇信佛教有直接的关联。

荣国夫人既笃信佛教,武曩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佛教之熏息,自不待言。……武曩幼时,既已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其受母氏佛教信仰影响之深切,得此一事更可证明矣。(陈寅恪,1980:146)

得于其家族信仰的熏息,武曩对佛教经典耳濡目染,为其随后从佛经中寻求理论根据奠定了基础。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武曩对佛教的赞助毫无疑问推动了佛经翻译的发展与革新。就其译经而言,武则天时期共译经186部1496卷,相当于隋代译经总数的三倍,占全唐总译经部数的42%,卷数占一半以上(《隋唐佛教史稿》pp.66-69)。在武曩对佛教的极力赞助下,佛经翻译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武曩注重礼遇高僧,遣使取经,组织翻译,丰厚经济待遇,官封译经僧人,提高译者的社会地位。区别于唐代以往的佛教赞助,武曩亲临法筵,参加译经活动,直接干预佛经翻译的过程。此外,武曩还亲自作序,组织讲经法会。总括起来,赞助者武曩对佛经翻译的操纵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控制译经的选取和译者的观点;在经济利益方面控制译经的收入;在社会地位上控制译者,使译者融入为她服务的意识形态之下的社团及其生活方式。武曩同时掌握着这三个因素的操纵,即是集中的无差别赞助(undifferenti-

ated patronage)(Lefevere,2004:17)。由此可知,武曩赞助佛教的传播实质上就是制约译者,操纵佛经翻译。

3. 武曩操纵佛经翻译的实例

如上所述,武曩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以及权势地位等三方面对佛经翻译实施操纵。当时的佛经译者处于武曩的直接操控之下,从翻译的选材到译著的接受无不受其制约。他们若想要译经事业得以继续和发展,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就得接受武则天的摆布,为其统治服务。倘若违背了这个权力意志,轻则会受到责备,重则丢掉性命。因此,翻译者只能通过改写佛经的翻译以取悦武曩,并为其政权服务。以下分别以《大云经》和《华严经》为例加以分析。

3.1 《大云经》

武曩颁行天下以女身当王国土之受命符谶的《大云经(疏)》被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科学者所重视,自然是由于此经与武曩篡唐称帝有关。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都记载《大云经(疏)》是薛怀义、法明等僧伪造,伪称武后为弥勒菩萨所生,当王国土,武后心喜,下令大造大云经寺,以藏大云经云云(《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p.121)。在敦煌出土《大云经疏》以前,学者对伪造《大云经(疏)》的说法深信不疑。然而,早在北凉时代就有译本,又名《大方等无想经》,且在隋唐记录也有注明译经僧就是昙无谶。另外还有一个译本,姚秦竺佛念译《大云无想经》。敦煌出土《大云经疏》残卷后,王国维(1959)著《唐写本大云经疏跋》也考证了《大云经疏》译本的真伪:

然后凉译本之末,固详说黑河女主之事,故赞宁僧史略谓此经晋代已译……故于武后载初元年书敕沙门法朗九人重译大云经,不云伪造,今观此卷所引经文,皆与凉译无甚差池。岂符命之说皆在疏中。经文但稍加缘饰,不尽伪托欤。(《观堂集林》pp.1016-1017)

故《大云经疏》不是重新撰写,亦不是伪译,而是薛僧等人接受了赞助者的操控,语内翻译^①昙无谶译本,即改写后的译文,以实现为赞助人武曩服务的目的。

按照儒家经典,妇人是不能参与国政的。“《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伪孔传(孔安国《尚书孔氏传》)云: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陈寅恪,1980)革唐立周之初,武曩需要寻找向民众宣传的理论依据,使其新取得的特殊地位合理化。于是僧人们为了取悦武曩,献上了《大云经》,其中以女身为王的经文,恰逢武曩以女人身份当皇帝之意。随后,武曩授命薛怀义等僧十人改写《大云经》,为其以女身君临天下找到依据。

《大云经》卷四“爾時佛告天女……以是因緣今得天身。值我出世複聞深義。舍是天形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所統領處四分之一……汝于爾時實是菩薩。為化眾生現受女身。”

^① 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把翻译分为:语内、语际、语符翻译;语内翻译是同一种语言内符号之间的改写。

卷六:是淨光天女者……為眾生故現受女身……七百年後是南天竺。有一小國名曰無明。彼國有河名曰黑闇。南岸有城名曰熟穀。其城有王名曰等乘。其王夫人產育一女。名曰增長……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闇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承奉無拒違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見。

《大云经》这两卷中均有“淨光天女”做皇帝的经文,托言佛尊授记。译僧有温饱之需,功名利禄之求,亦或还有宗教信仰之信,所以他们接受武曌的操控,借《大云经疏》的改写以巴结、讨好武曌,改写经文宣称武曌乃是弥勒菩萨所生,应当以女身当皇帝。于是,在武曌的意识形态操控下,译僧改写的大乘经典就成了她篡唐称帝的理论基础,证明她以女身称帝是受命于佛,而不同于往昔男身称帝是受命于天。佛的预言,是上天注定的,“受命于佛”的合法身份使武则天掌握政权变得合理化。

除此之外,武曌还操控译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大云经疏》颁布之后,武曌立即令两京诸州修建大云寺,藏大云经疏于各寺,并封参与改写的九位译僧为县公,并赐紫袈裟、银龟袋,为译僧提供丰厚的物质待遇。大周天授二年(691年),武曌颁令释教在道教之上的制度:

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以归依,极群生于迴向。布告遐邇,知朕意焉。(《武曌与佛教》p. 150)

武曌宣告天下释教地位高于道教,一改唐初道教处于佛教之上的宗教局势,颠覆唐太宗颁诏的道士、女冠者在僧尼之上的诏令。此举既提升了译者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佛教的地位。封译僧为官,用行政命令把释教的地位置于道法之上,利用权力控制译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目的就在于操控佛经的翻译,使之成为代表武曌意志的意识形态服务。通观武曌之所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操纵《大云经疏》的改写:操控译僧的意识形态,控制译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其目的则是借佛教经典《大云经》的改写向全国宣讲她授命“以女身为王”的合法性,以巩固其掌握的政权。

3.2 《华严经》

与历代皇帝不同,武曌自身崇信佛教,且有家族渊源。其母亲家族隋皇族杨家笃信佛教,故武曌早在幼年时便对一些佛教经典耳濡目染。于是,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的选材受控于武曌的个人喜好或个人需要。在武曌的直接支持下创立而成的华严宗所尊奉的《华严经》便是由武曌亲自取材,亲自组织翻译而得以广泛流传。《华严经》早在东晋和其后的南北朝时期就有过译本,组织翻译之前武曌对该经早有了解,而且很是喜欢。于是,当听说于阗国有梵本《华严经》,便遣使求访,并迎请译僧实叉难陀,令其重新翻译,也就是“新译”。

取来于阗梵本之后,武曌操纵僧人组织译场。于阗国僧人实叉难陀携带梵本经文来到洛阳后,武曌安置其在东都洛阳大内大遍空寺开始翻译,并组织译场,而译场则是意识形态操控的最大体现。所组译场有职司人员共32人,包括外籍11人,本国21人。职司名称有释梵本、证释梵本、译

语、释语、证梵语、缀文、证义、写梵本、经生、监护共十种。武曌命实叉难陀担任译主,令三藏沙门菩提流志、释义净和阿你真那一同证释梵本。译主的职责主要是释梵本,而难陀刚至中土,并不够译主资格,所以配备三藏沙门担任“证释梵本”,由此可见其译场分工明确,组织已经相当完善。除此之外,武则天时期译场还有一大特点,不委派三品以上重臣参与译事,而是让翻译使官专职译事,这是之前所未有过的,武曌将译场职司提升到更周密规范的水平。

武曌不但左右《华严经》译本的选取,操纵译场的组织,还亲自为其写了篇序言:

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宸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祯绝瑞,既日至而月书;贝牒灵文,亦时臻而岁洽。逾海越漠,献琛之礼备焉;架险航深,重译之辞罄矣。(《全唐文》卷97)

序中先是《大云》,又有《宝雨》,这两篇经文都提到“以女身为王”,其目的则是反复申述她做皇帝是符合佛的预言的。更有意思的是,她给自己起名为“曌”,意为“日月当空”,与《大云经》中“淨光天女”和《宝雨经》^①中“名曰日月光”有异曲同工之意,更明确地指出她就是经中当王国土的“天女”。

此外,武曌对译僧也有很高的礼遇。首先是《华严经》译主实叉难陀,武曌听说其手中有梵本《华严经》,特发使求访译本,并迎请难陀担任译主;再则是礼遇证释梵本三藏沙门释义净,证圣元年(695年),义净携带四百部梵本经律论归国,武曌亲自到洛阳东门外迎接,并把他安置在佛授记寺内着手经文翻译,之后参与《华严经》的翻译;另一证释梵本沙门菩提流志,其本名为达摩流志(唐语法希),因其重译《宝雨经》而备受武曌尊崇,特享武曌为其改名为菩提流志(唐语觉爱)。武曌之所以如此敬重译者,正是为了操控译者和译者为其政治服务。因为武曌的礼遇,译者欣然接受她的操控,将译本改写直至适应武曌统治之需。新译《华严经》将旧译第一品《世界净眼品》改为《世主严妙品》,即“佛及诸王,并称世主”。也就是说,佛就是诸王,诸王也就是佛,称皇上乃是当今如来佛,一开始就神话世间主,将武曌的形象神圣化。

从《华严经》的取材到译场组织都有武曌操纵的影子,她甚至亲自参与翻译为之作序,这足以看出她对此经翻译的重视。该经的整个翻译过程都是在武曌亲自策划、关注下译制,其赞助者角色对翻译的操控无处不在。

4. 对译经接受的操控

佛经的传播和传诵形式主要有三种:口译、笔译及传诵。译经的接受主要是通过译场或翻经院和僧人传诵两种

^① 《宝雨经》菩提流志译,曰“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曰日月光……汝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

途径。唐初,佛经传译中心主要集中在长安。据马祖毅(2004:141-151),外籍译僧波顿应邀与另18名翻译人员在长安兴善寺开始译经,四年共译出《大庄严论》等3部,合35卷;求法高僧玄奘于贞元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并着手佛经翻译,其译场搬迁三次,先在弘福寺,后迁至大慈恩寺,最后在玉华宫,期间共译经论75部,1335卷。届时,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因此,译经也主要在此进行传播和接受。

武则天时期,武曌将译经中心由长安转移至洛阳。这一时期从事译经的高僧主要聚集在洛阳的大周东寺、佛授记寺、大遍空寺、福先寺、天宫寺、三阳宫以及长安西明寺、清禅寺和崇福寺进行佛经的翻译和传诵活动。如实叉难陀在洛阳的佛授记寺翻译了《华严经》,并于圣历二年译成,奉诏在佛授记寺讲之,并于长生殿为武曌讲六相十玄之义(华严宗四大教义:法界起源,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圆融);菩提流志在佛授记寺译《宝雨经》,印度僧人阿你真那先后在佛授记寺、天宫寺、福先寺等进行过佛经的翻译。由此可见,此时的译经中心已经不再是长安,而是转移到了洛阳。武曌以洛阳取代长安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政治原因,定都洛阳是武曌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目的;另外,也有武曌躲避王氏和萧氏阴魂纠缠之说。不管是为了什么,武曌转移译经中心,就是直接地控制译场和传诵途径,换言之,即操控译经的传播和译经接受。

5. 结论

武则天时期,武曌操控权力大力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佛经翻译也达到了鼎盛,其中武曌的赞助作用功不可没。操控译者的意识形态,掌控译者的经济以及社会地位,影响译经的传播和接受,武曌操纵着当时佛经翻译

的整个过程,将译经事业推向了一个高潮。从改写理论之赞助人系统的视角探讨武曌在佛经翻译中的角色,不仅扩展翻译研究视域,也为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2] 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3] Milton, J. & Paul, B. *Agents of Transl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9.
- [4] 陈寅恪. 武曌与佛教 [C] // 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 杜斗城. 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几个问题 [J]. 宗教学研究, 1994(21): 26-33.
- [6] 刘平军.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7]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 王国维. 唐写本大云经跋,《观堂集林》第四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王鸿宾, 胡春英. 关于《风峪石经》中的武周改字和武则天时期的佛典翻译 [C] // 武则天论文集, 1997.

收稿日期:2011-08-17

作者简介:张青青,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冯革